

满文《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版本及其价值

徐 莉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满文处, 北京 100031)

摘要:《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历经多次修纂校订,形成了不同朝代的版本,各版本各具特色,内容记载也不尽相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清代各朝纂修的《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满文本,其形制、体例各有差异。掌握满文《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诸本的纂修情况,有助于深化清代满文古籍版本、满语文演变及清史史料等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清实录;皇太极;满文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7873(2021)01-0086-09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以下简称《清太宗实录》)是清代官修记载清太宗皇太极一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民族、天文、地理等诸多方面重要历史事件的编年体史籍,是研究清太宗一朝史事的重要文献。《清太宗实录》研究成果颇多,代表性论著为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1]、谢贵安《清实录研究》^[2]、齐木德道尔吉《关于康熙本〈三朝实录〉》^[3]、庄吉发《清太宗汉文实录初纂本与重修本的比较》^[4]、胡恒《〈清实录〉内阁小红绫本下落考》^[5],还有一些《清实录》研究成果直接涉及《清太宗实录》的相关情况。这些成果从《清太宗实录》纂修校订、汉文各本内容差异、各版本在国内外的收藏流转等不同侧面进行探讨,为《清太宗实录》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不过,受语言文字和文献收藏等方面的限制,挖掘运用满汉文档案,并结合满文《清实录》实体开展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史料的不断开放和满文全文检索数据库开发使用,为满文文献研究提供了更多文献资源,为满文《清实录》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笔者拟梳理满汉文档案及相关史料,尝试厘清《清太宗实录》纂修与校订过程,梳理满文《清太宗实录》各版本特色,阐释其价值,以便于满文《清太宗实录》不同文本得到广泛的研究利用。

一、满文《清太宗实录》诸本的纂修

《清太宗实录》经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多次修纂和校订,形成不同版本。其纂修和校订情况见诸于清代官修史籍和满汉文档案。

1. 顺治年间初修

清初纂修《清太宗实录》的时间,迄今见到的最早记载为顺治六年(1649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全宗内国史院档记载了正月初八日开馆情形。

收稿日期:2021-05-06

作者简介:徐莉(1976-),女(满族),辽宁锦州人,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清代满文档案整理编目及翻译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项目编号:20VJXT017)

是日,皇父摄政王著纂修太宗实录。敕内三院大学士:择于初八日开馆,照例择内三院满、汉大学士七人,学士六人,主事五人,编检官八人,博士、笔帖式、典籍官共四十三人,书办十人,共七十九人,交礼部。置皇父摄政王敕书于衙中黄案上,内三院大学士七人跪,内大臣乌拜捧敕文逐一授之。大学士立,率众官以授敕之礼向宝座行三跪九叩礼。礼毕,按级就座,宰得牛羊之肉,整置桌案,钦差之内大臣乌拜宴之。宴毕,以飨恩之礼向宝座行一跪三叩礼。编纂月俸银,大学士各二十九两三钱,学士各十四两六钱,主事、编检各八两五钱,博士、笔帖式、典籍官各四两五钱,书办各三两一钱。

为修太宗实录,赐内三院大学士范文程巴克什、刚林巴克什、祁充格、冯铨、洪承畴、宋权、宁完我等敕书云:皇父摄政王谕大学士,兹者择于顺治六年正月初八日开馆恭修太宗文皇帝实录。朕唯帝王抚宇膺图,绥猷建极,凡一代之兴,必垂一代之史,记纂编修,以覲扬于后世,诚要务也。我太宗文皇帝,安内攘外,在位十有七年。仰唯文德之昭,武功之盛,以及号令赏罚,典谟训诰,皆国家之大经大法,尔等皆稽核记注,编纂修辑,毋浮夸以失实,毋偏执以废公,毋疏忽以致阙遗,毋怠玩以淹岁月。尚其夙夜勤恪,考据精详,敬成一代之令典,以副朕意。钦哉。^[6]

此段记载详细描述了开馆纂修《清太宗实录》情形,从中可以了解到相关的几个具体问题。

其一,有关皇父摄政王多尔衮敕令纂修《清太宗实录》的史实,与《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记载稍有差别。《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乾隆本载:“纂修《太宗文皇帝实录》,命大学士范文程、刚林、祁充格、洪承畴、冯铨、宁完我、宋权充总裁官,学士王铎、查布海、苏纳海、王文奎、蒋赫德、刘清泰、胡统虞、刘肇国充副总裁官。”^①该句段没有主语,未写明敕命的颁布者。顺治六年(1649年),顺治皇帝尚未亲政。《内国史院档》的此项记载则明确说明,摄政王颁布敕书给内三院纂修《清太宗实录》。

其二,明确此次开馆时间和纂修人员。择于顺治六年(1649年)正月初八日的有关记载,直接说明开馆时间是特意选择的。纂修人员的职衔从大学士、学士到书办,涉及不同层级的官员。以内三院满、汉大学士居首,纂修人员达79人。

其三,开馆仪式尊崇一定仪轨,筵宴具有满洲部族特色。从礼仪来看,授予敕书时,按照“受敕之礼”行礼;筵宴时按等级就座,筵宴之后按“飨恩之礼”行礼,各按仪轨和品级而行,体现了官阶位次。“宰得牛羊之肉,整置桌案”,宴席明显带有满洲部族自身的饮食特色。

其四,明确编纂人员费用和编纂标准及目标。编纂人员按月支給俸银,俸银数目按照品级给予,数量明确。

其五,编修标准和目标清晰。即“尔等皆稽核记注,编纂修辑,毋浮夸以失实,毋偏执以废公,毋疏忽以致阙遗,毋怠玩以淹岁月。”即不失实,不废公,不遗漏,可长久,编修目标被确立为《清太宗实录》“成一代之令典”。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病故。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世祖福临亲政。因多尔衮之案,总裁官范文程革职留任,刚林、祁充格获罪被斩,多名纂修太宗实录官员折损。顺治八年(1651年)十二月二十五,内院大学士希福奏请纂修《清太宗实录》。“恭唯我太祖武皇帝开创丰功,太宗文皇帝嗣位即命儒臣纂成实录,功德昭如日月,漠烈垂诸奕祀。臣等伏思,太宗文皇帝德业弘远,益扩丕基,必备载史册,永为法守,用昭我皇上孝思,且皇上躬亲大政以来,事事恪遵太宗心法,纂修实录大典,尤不可缓。谨请皇上敕行,期于速竣,则太宗功德彰于永久,而皇上承先之志弘光矣。伏乞特颁敕谕,行臣衙门纂修,应用官员人役,臣等另疏具奏。其公费钱粮,乞敕下该部察例,奏请报可。”^②他列举了太宗即位时即命纂修《太祖武皇帝实录》之例,提出应行纂修《清太宗实录》。

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二十九日,“命纂修《太宗文皇帝实录》,以大学士希福、范文程、额色黑、洪

①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42,乾隆四年序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文献数据库全文数字化《大清历朝实录》。本文所引实录史料皆源出此全文数字化《大清历朝实录》。

②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61,乾隆四年序本。

承畴、宁完我充总裁官”^①。总裁官5人,学士伊图等12人为副总裁官,以侍读学士麻禄等26人为纂修官。同时,“赐希福等敕曰:朕惟帝王,抚宇膺图,绥猷建极,凡一代之兴,必垂一代之史以观,扬于后世,诚要务也。我太宗文皇帝应天顺人,安内攘外,在位十有七年。仰唯文德之昭,武功之盛,以及号令赏罚,典谟训诰,皆国家之大经大法。尔等稽核记注,编纂修辑,尚其夙夜勤恪,考据精详,毋浮夸以失实,毋偏执以废公,毋疏忽以致阙遗,毋怠玩以淹岁月,敬成一代之令典,永作万年之成宪,各殚乃心,以副朕意。钦哉”^②。这道敕谕表明,顺治帝对编纂《清太宗实录》的高度重视,其对纂修人员明确提出的纂修要求和目标与顺治六年(1649年)相同。

顺治十一年(1654年)二月初八日,奏请何人可以列入实录序言。由于纂修实录时间比较长,人员和职位均有变化。“初八日,谨奏:为监修实录之大臣等姓名列入序文事。大学士冯铨、刘正宗,后补放大学士,总裁其事,但未给敕书,故此等姓名应否列入序文。大学士图海、张端、成克巩等原以内阁学士衔辅佐总裁,后授大学士,总裁其事,但未给敕书。此等姓名或列内阁学士衔,或列入大学士衔等情,由大学士额色黑、内阁学士希图等奏上。奉旨:冯铨、刘正宗等既然后补放大学士,未给敕书,故不必列明。图海、张端、成克巩等既然原为内阁学士,未给敕书,故列为原内阁学士衔。特谕。”^{[6]298}

按照官修史书的惯例,既然开始撰写序文,即表明《清太宗实录》正文大部分书稿已经纂修完成。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十二日,内翰林国史院侍读黄机在奏请纂修圣训的奏疏中讲到:“年来纂修太祖、太宗实录告成。”^③这则《清太宗实录》告成的确切记载,清晰表明本年同时纂修完成了太祖和太宗实录。

从目前存本看,确实有两部太祖和太宗实录从封面、纸张、装帧、版式、满文书写特点、纂修体例等方面都很一致的版本,即《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四卷精写本和《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六十五卷精写本,目前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均有存藏。

顺治朝纂修《清太宗实录》历经波折,经历了摄政王摄政时期的初纂,后有因摄政王而获罪等人员变动,再有顺治皇帝亲政后的再次纂修,终有成本留存。

2. 康熙年间重修

康熙六年(1667年),题请重修《清太宗实录》。该题稿未具名。

题为请旨事。康熙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皇上召臣等至内殿谕,前修《太宗文皇帝实录》内有字义未当,姓名舛错者,可详阅具奏。臣等钦遵谕旨,将第一套满字五卷另行誊录,应更改者更改缮写,恭呈御览。[嗣后]今臣将续改第二套将原档[陆续]与[原]前修[副本]实录详加校勘,不唯字义未当,姓名舛错,且有前后颠倒者,有[原档所载]于例应存而遗漏者,有琐屑事务例不应书而书者,有一事前后重复者,[有不书干支止书年月日者],至于年日干支并未书载,[有]且满汉文对勘,有词义舛错不合者,有[满汉]词义虽合,而汉文近于俚俗,[且]并语气未顺者。实录一书载我太宗文皇帝圣德神功,垂宪[后]万世,[实]允系大典。诸如此类[似]应增应损,似应重修。前虽未经誊写正本告成,然已缮副本进呈御览,今臣等未奉[上谕]谕旨,不便[辄]擅行更改。应否重修,伏候上裁。谨题请旨。^[7]

该题稿列举了之前所纂修《清太宗实录》满文本诸多问题,如,字义不当、前后颠倒、内容遗漏重复、体例上纪年不一致等,题请重修。又提及,已经缮写副本进呈御览,因没有谕旨,不便擅自更改,是否重修,等候圣裁。该年十一月癸亥(二十三日),“命内秘书院大学士班布尔善等,校对《太宗文皇帝实录》”^④,至康熙十二年(1673年)七月二十一年告成。《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亦记载,丙寅日(即二十

①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62,乾隆四年序本。

②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62,乾隆四年序本。

③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乾隆本,卷89。

④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4。

二日)“太宗文皇帝实录告成”^①。

康熙朝在原本之上重修一事,在康熙本的御制序中也有提到。“旧编实录六十有五卷,皇考世祖章皇帝尝命和硕郑亲王等,重加校阅,未及蒇事。朕嗣服丕基,仰承遗志,特令儒臣,蒐讨订正,纂辑成编,卷帙如旧。”^②

3. 雍正和乾隆年间校订

雍正十二年(1734年),降旨校订《清太宗实录》,至乾隆初年成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内援引雍正年间校订前三朝实录的情形,清晰描述了校订缘由。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初四日,内阁奉上谕:“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内,皇考以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中,人名、地名、字画、音句之属,有与《圣祖仁皇帝实录》未曾画一者,特命大臣等敬谨查对,酌改缮写,以昭示万年。朕即位之初,诸臣正在办理。因将恭加列祖尊谥字样增入书中。唯皇祖实录未有重修之处,是以恭加尊谥未增入。朕思,四朝实录理当画一。皇祖实录内应将恭加尊谥增入,方与列祖相符。目今正值重缮列祖实录之时,敬将恭加皇祖尊谥增入实录内,每卷只须换写前后两幅,亦理之可行者。后世子孙不得援以为例。著内阁将朕此旨谨记档册。钦此。”^③该上谕表明,雍正十二年(1734年)对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中人名、地名不一的情况进行查对、修改、缮写;乾隆即位不久,增入谥号,撤换了各卷前后写有谥号的书页。我们根据该谥号增补情况,可以考证版本形成年代。

雍正皇帝薨逝,《清太宗实录》未及完成,但已初具规模。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登基不久,总裁官大学士鄂尔泰等奏报校订三朝实录的情况。

总裁官大学士臣鄂尔泰等谨奏,臣等仰遵大行皇帝谕旨,恭奉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三朝实录共二百一十九卷,三朝圣训共一十六卷,校对画一。臣等率同内阁翰林等员悉心恭校,另行缮写,陆续敬呈大行皇帝御览。共进呈《太祖实录》十卷、《清太宗实录》五十六卷,所有未经进呈《清太宗实录》五十七卷至六十五卷共九卷,《世祖实录》共一百四十四卷,现在敬谨校对,将次告竣,陆续缮写。恭遇皇上应符御极,缙绅膺图,式瞻列祖之谥,用绍前徽之业。臣等敬遵谕旨,恭奉三朝实录,陆续进呈睿览,伏候训定。谨奏。^④

此件奏折说明,当时即已校对完成的《清太宗实录》已经进呈至五十六卷,剩余五十七至六十五卷共九卷正在校对中,缮写后陆续缮写进呈,遂成书。

二、满文《清太宗实录》诸本特点

《清太宗实录》历经数次纂修和校订,形成了多个版本。从已知可查询到的目录及各地收藏信息看,满文《清太宗实录》有顺治本1部、康熙本1部、乾隆本5部,其中乾隆本有小黄绫本1部、小红绫本2部、大红绫本2部。盛京藏大红绫本1部现存辽宁省档案馆,其余成体系的藏本均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另有少量小红绫本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1. 顺治朝精写本

顺治朝精写本卷六十五、首一卷。满文封面及卷端题名为 daicing gurun i taidzung genggiyen šu hūwangdi yargiyan kooli,汉文译作“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开本高37.2cm,宽23.3cm;版框高27cm,宽18.1cm。包背装。四周双边朱丝栏,半叶9行,红口,双鱼尾,版心内有满文书名、满文页码。卷首有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04。

②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乾隆四年本,卷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九月二十二日序。

③ 军机处上谕档,盒号550,册号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④ 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38-0001-041,总裁官大学士鄂尔泰等奏为遵旨恭校三朝实录等陆续进呈事,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序、目录。序言没有明确标注纂修朝年。但根据序文及版式等信息,还是有一些线索可以进行考证。

依据顺治朝精写本的卷首序言,我们可推断其纂修朝年。序言内有两处内容,可以作为判断朝年的称谓记载,一处写有 taidzu horonggo hūwangdi ten be ilibure, ama taidzung šu hūwangdi nonggime badarambure de, amba doro be mutebuhebi, 义为“太祖武皇帝肇纪立极,父太宗文皇帝增隆,大道已成”;另一处写有 taidzu i yargiyan kooli be bithe banjibufi, da i doro be eldembuhe bi. ama hūwangdi gurun be alifi, juwan nadan aniya bihe, 义为“编纂太祖实录,已彰显原道。父皇立国,已有十七年”。仅此两处称太宗为父,证明该序文必为顺治皇帝所作。按照官修史籍一贯先纂修成正文,后请御制序文的惯例,此本即为顺治朝本。

另可从康熙本中夹条的内容,尝试推测顺治本没有具写朝年时间的原因。康熙本内序言时间为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九月二十二日,此页有一夹条,写有 nikan bithei sioi i dubede elhe taifin i orin emuci aniya uyun biyai orin juwe seme arahabi. manju bithede akū. erebe nikan bithei songkoi nonggime araki, 义为“汉文序末写有康熙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满文本内无,将此按汉文本增写”。这说明在康熙本中汉文本序末写有日期,满文本序末无日期,是后来参照汉文书写法,于满文序末增入了时间。以此可以推断,顺治满文本序末也没有具写日期,可能是一个惯例,康熙及以后才有满文本序末具写日期之例。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推断。

2. 康熙朝精写本

康熙朝精写本卷六十五、首一卷。满文封面题名为 daicing gurun i taidzung šu hūwangdi i yargiyan kooli, 汉文译作“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端题名为 daicing gurun i taidzung abka de acabume, gurun be mukdembuhe, doro be amban obuha, horon be elgimbuha, gosin onco, gūwaliasun enduringge, giyoosungga erdemungge, ten be badarambuha, gung be eletulehe, genggiyen šu hūwangdi i yargiyan kooli, 汉文译作“大清太宗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隆道显功文皇帝实录”。开本高 37.1cm, 宽 22.6cm, 版框高 24.7cm, 宽 17.5cm。包背装。四周双边朱丝栏, 半叶 10 行, 红口, 双鱼尾, 版心内有满文书名、满文卷次、满文页码。卷首有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九月二十日序、目录。

3. 乾隆朝小红绫精写本

乾隆朝小红绫精写本卷六十五、首三卷。满文封面题名: daicing gurun i taidzung genggiyen šu hūwangdi i yargiyan kooli, 汉文译作:《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端题名: daicing gurun i taidzung abka de acabume, gurun be mukdembuhe, doro be amban obuha, horon be elgimbuha, gosin onco, gūwaliasun enduringge, giyoosungga erdemungge, ginggun mergen, eldengge tomonghonggo, ten be badarambuha, gung be eletulehe, genggiyen šu hūwangdi i yargiyan kooli。汉文译作:“大清太宗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隆敬敏昭定道显功文皇帝实录”。开本 37.1×23cm; 板框 24.9×17.5cm。包背装。四周双边朱丝栏, 半叶 10 行, 红口, 双鱼尾, 版心内有满文书名、满文卷次、满文页码。卷首卷一有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九月二十二日序、凡例; 卷首卷二有总目、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九月二十二日进实录表; 卷首卷三有乾隆四年(1739年)十二月初十日序、乾隆四年(1739年)十二月初十日进实录表。

该小红绫本有两部, 其中一部有红绫函套, 存藏完整。另外一部小红绫本没有函套, 存藏卷数不全。据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记载:“1970年, 国史馆经政府的核准把他们收藏的一些满文清实录赠给了故宫博物院。”^{[1]116} 胡恒撰文介绍追索内阁藏《清实录》小红绫本时, 详细开列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太宗实录》满文本共 14 卷。^[5] 笔者对照发现, 这 14 卷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无函套小红绫本中所缺少的部分一致。因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实录》同源, 可以确定这两部分可合为另一部完整的小红绫本。

4. 乾隆朝小黄绫精写本

乾隆朝小黄绫精写本六十五卷。封面题名与乾隆四年小红绫精写本同。开本高 33.2cm, 宽 20.1cm。包背装。无版框、无界行、半叶 9 行。该本没有卷首。

卷端有太宗皇帝谥号 *ginggun mergen eldengge tomohonggo*, 义为“敬敏昭定”。太宗皇帝谥号追加情形在乾隆本末卷有详细记录:“上在位十有七年, 寿五十有二。辛未, 诸王大臣等, 迎梓宫, 奉安于崇政殿。九月, 壬子, 葬昭陵。十月, 丁卯, 上尊谥曰: 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 庙号太宗。康熙元年, 加上尊谥曰: 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隆道显功文皇帝。雍正元年, 加上尊谥曰: 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隆道显功文皇帝。乾隆元年, 加上尊谥曰: 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①雍正元年增加了“敬敏”二字, 乾隆元年增加了“昭定”二字。从谥号推断, 该本即为乾隆本。

5. 乾隆朝大红绫精写本

乾隆朝大红绫精写本六十五卷、首三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封面题名与乾隆四年小红绫精写本同, 蝴蝶装。开本高 44.5cm, 宽 29.1cm, 版框高 26.9cm, 宽 19.6cm。四周双边朱丝栏, 半叶 9 行, 白口, 版口有满文书名、卷数、页码。该本卷首内容与乾隆本小红绫本同。唯一不同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卷首乾隆序时间为乾隆二年(1737 年)十二月初十日序。序中提到太宗皇帝谥号与乾隆四年(1739 年)序小红绫精写本同。为何皇史宬藏本乾隆朝序言时间为乾隆二年。按照乾隆朝及以后《清实录》小黄绫进呈, 经皇上钦定后抄录小红绫和大红绫本的纂修缮写流程来看, 或者该大红绫本率先缮写完成, 或者书写有误, 还需进一步考证。

原盛京藏大红绫精写本现藏于辽宁省档案馆。经笔者与辽宁省档案馆何荣伟研究员求证, 该馆藏大红绫满文精写本为乾隆四年(1739 年)十二月初十日序本, 为乾隆帝第一次东巡去盛京之前奉旨誊写抄录、送去盛京尊藏之本。乾隆八年(1743 年)五月二十四日, 内阁奉上谕:“奉天乃我朝发祥之地, 历朝实录俱应缮写满汉文各一部送往尊藏。俟现在皇史宬内阁藏本写成后即著在馆人员敬谨缮写。”^②此谕清晰说明了盛京藏本的来源。

三、满文《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诸本比较

由于纂修朝代不同、认知变化等各种原因, 各满文本在纂修体例、书写格式等方面各有差异。

1. 纂修体例各有不同

顺治本和康熙卷前仅有序和目录, 并无其他信息。乾隆本不同, 卷首有三卷, 首列康熙朝序、凡例、总目和进实录表, 后列乾隆朝序和进实录表。满文本与汉文本也略有不同, 汉文乾隆本有修纂官衔名, 满文本则没有。

顺治本的满文目录与康熙本及乾隆本均稍有差异。如顺治本卷二十八, 目录时间为天聪十年(1636 年)自三月至二十六日。康熙及乾隆本该卷目录时间为天聪十年(1636 年)三月至四月。顺治本卷三十七目录时间为崇德二年(1637 年)七月初一日至二十六日, 康熙及乾隆本该卷目录时间为崇德二年(1637 年)七月。

体例上也体现满文本借鉴汉文本的体例, 不断加以完善的过程。卷首卷末题名稍有不同。顺治本每卷卷首有简单题名及卷次, 如: *daicing gurun i taidzung genggiyen šu hūwangdi yargiyan kooli orin jakūci debtelin*, 义为“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十八”。每卷卷末没有题名及卷次。康熙及乾隆本每卷卷首及卷末均有带完整谥号的题名及卷次。康熙本内夹条反映了这一变化的原委。康熙本目录末页有夹条, 写有 *nikan bithei wajima bade, daicing gurun i taidzung abka de acabume, gugun be mukdembuhe, doro be amban obuha, horon be algimbuha, gosin onco, hūwaliyasun enduringge, giyoosungga erdemungge, ten be*

^①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乾隆四年本, 序, 汉文本, 卷 65。

^② 内阁题本, 档号: 02-01-005-022761-0028, 大学士鄂尔泰题为奉上谕缮写满汉历朝实录等事, 乾隆八年(1743 年)七月初四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badarambuha, gung be eletulehe, genggiyen šu hūwangdi i yargiyan kooli i uheri ton seme arahabi, manju bithe akū, erebe nikan bithei songkoi nonggime araki, 汉义为“汉文本完结处写有‘大清太宗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隆道显功文皇帝实录目录’, 满文本没有, 将此按汉文本增写入”。

从这段夹条的记载来看, 满文本在卷末是没有题名和卷次的, 是后来参照汉文本增写上去的。顺治本中, 每卷卷端才有题名和卷次, 卷末没有。而在康熙本上, 在每卷卷末均已书写题名和卷次。

2. 书写格式各有不同

从格式上看, 抬格和皇帝名讳书写略有差异。顺治本内有两种抬格方式, 第一种为空抬, 即缮写时“对示以尊敬的字在空出格后书写”^[8]; 第二种是抬一格。每页都在上面布有一条暗线, 为平抬线, 写到线上者为抬格。在顺治本中, 空抬和单抬一格的现象很多。抬格的词也大体一致, 如, han“汗”、sure han“聪睿汗”、taidzu“太祖”、abka“天”、hese“旨”、bi“我”(指清太宗本人时)、hūng taiji“皇太极”、gosin“仁”、ama han“父汗”等, 康熙本和乾隆本没有空抬格式。满文为拼音文字, 书写不像汉字方块字那样长短一致, 但依然可以看到单抬一格的形式。顺治本出现了太宗皇太极的满文名字, 写作 hūng taiji, 没有任何遮挡。在康熙本和乾隆本内, 凡有太宗满文名讳之处, 均用黄色绫子覆盖粘贴, 见不到太宗名讳。断句也有所不同。顺治本用标点符号; 康熙本不同日期或不同事件之间, 用红色圆圈加以区分, 起到了断句的作用。

3. 修改信息各有不同

顺治本和康熙本内均有夹条, 写着不同的修改信息, 与各本书写内容对比, 可反映出不同的认知, 为进一步研究各本内容上的差异提供了更多参考。

顺治本卷二内有夹条, 写有 erei gebu gangguri waka, g' angguri,^① 义为“此名字 gangguri 错误, g' angguri”。此人当时为派往广宁的使臣。在顺治本中写的是 gangguri, 即此夹条所说为错误的信息。

康熙朝《清太宗实录》满文本内存在很多对内容进行修改的满文夹条。与康熙本中的夹条对照发现, 夹条内容进行了修改。笔者列举康熙本卷一第三页的夹条, 满文为 fejergi afaha i duici jurgan i coohai gaifi yaburengge manga, bithe de amuran sehebe. dorgici tucibuhe yargiyan kooli de fulgiyan fi i dasahangge cooha gaifi yaburengge endure adali banin bithe suduri de amuran sehebi. jai ningguci jurgan i ilan se ci saha babe onngorakū sehebe fulgiyan fi i dasahangge ilan se ci saha babe uthai ejembihe sehebi. ejen i dasahangge, gisun ambalinggū bime umesi acananhabi. uthai ere songkoi dasaki, 义为“下页第4行‘精于用兵, 爱好典籍’由大内取出实录内朱笔修改为‘用兵如神, 性嗜史籍’。再, 第六行‘三岁所见不忘’朱笔修改‘三岁所见即牢记’。皇上所修改者, 言语庄重, 且甚合宜, 即按此修改”。此夹条说明, 有关内容经皇上亲自用朱笔修改, 所改内容用词细微之处, 可见一斑。由此得知, 此内容确实按照皇上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康熙本此处内容即为修改后的内容, 说明夹条所记载的为康熙皇帝修改内容。

在顺治本和康熙本中, 这样的夹条存有不少。康熙本夹条有墨笔工整书写者, 也有朱批书写者。在清代中央国家机关的文书档案中, 朱批书写者皆被视为皇帝本人书写。夹条所记载内容牵涉甚广, 如记载内容有误、满汉文不一致、满文书写错误等多种情形。还有皇上看出实录所记载内容有误, 经多方查实而进行修改的情况。有的夹条为一件折件, 把相关问题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楚, 查实后才对内容进行修改, 充分说明皇帝确实详细披览了此满文本《清太宗实录》。

关于各版本之间内容的差异, 以往亦有相关论述。陈捷先著《满文清实录研究》讲到:“由于清太宗实录满文初修本现在无法看到, 我们只能就汉文本的内容去推知其中情形了。清初帝王实录既然是先作成满文的本子, 而后由满译汉的, 当然汉文的内容一定是满文而来的了。”^{[1]104} 庄吉发《〈清太宗汉文实录〉初纂本与重修本的比较》^[4]一文从多个方面做过论述, 所论皆以汉文本为依据。满文各本正文皆有六十五卷, 对比内容差异的工作量巨大, 仍需进一步挖掘整理, 才能更好梳理各本之间内容差异。满

① 内阁满文实录, 档号: 02-08-002-000011-000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语满文的差异和特色尤其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满文《清太宗实录》诸本价值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皇帝的实录与其他朝代相比,数量较多,内容丰富,自清太祖至穆宗每代都有满文本,值得深入探讨。对满文《清太宗实录》诸本的梳理,在满文古籍版本、满语满文发展演变和清史史料价值方面均有广泛的研究意义。

第一,在满文古籍版本方面,诸本均体现了不同的版本价值。满文《清太宗实录》诸本在装帧、封面、版式、书写字体、存藏、功用等多方面均体现出不同的版本特色。顺治本满文《清太宗实录》在同朝官修典籍中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装帧为包背装,封面红绫颜色比乾隆本稍深,纸张厚实,满文书写字体古拙质朴,尚并无忌讳。从装帧、纸张、满文字体方面比对,与顺治朝时所修《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玉牒有相同的版本特色,在顺治朝官修典籍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康熙本书写版式上,各卷在卷首卷末的题名上互相呼应,干支纪年清晰、句读标志明显,较顺治本更加规整。至乾隆朝始有五部本之例。乾隆朝小黄绫本为正本修成时的进呈之本,供皇帝钦定,而后抄写其他各红绫本,后存内阁。乾隆朝小红绫本,一部原藏乾清宫,一部原藏内阁大库。其功用有二,一是供皇帝例行阅览,二是供修纂各史书参考使用。乾隆朝大红绫本为尊藏之本,分藏皇史宬和盛京。其装帧方式为宋代以后少见的蝴蝶装。此大红绫本将这一装帧方式进行了改进,将背面无字之页粘贴起来,更方便阅读。清代此种装帧方式在官修典籍中目前仅见历朝实录和圣训的大红绫本,其版本特色不言而喻。

第二,在满语满文方面,诸本为满语满文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语料。满文《清太宗实录》始修至最后形成的乾隆本,历时90年,正值刚入关政治军事上开疆扩土,满汉文化深度融合之际,满语满文深受汉语言文化影响。满文《清太宗实录》中满语满文变化的线条清晰可见。顺康乾三朝本,正文各六十五卷,各数万言,单从专有名词中人名、地名书写上,均能感受到其中的变化,更别说其中包含的词、词组、句子所涉及变化之复杂,无疑为满语文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语料。顺治本语句记事表达更为朴素,而康乾本多了很多修饰和描写,细细分析可见其统治地位的变化,引起了对以往历史事件认识的变化。

第三,在史料价值方面,诸本为清太宗朝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文献基础。清太宗时期,清朝尚未入关。目前研究者广泛使用的史料多以《满文老档》^①太宗朝部分史料、满文本牌^②、逃人档和盛京五部档^③、《天聪九年档》^[9]、天聪朝崇德朝《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6]等档案史料为依据。使用《清太宗实录》开展研究者,多以乾隆四年(1737年)序汉文本为主要史料依据,鲜有使用其他各本开展研究,更少有以满文本作为文献依据。满文《清太宗实录》诸本对比,可知《清太宗实录》不同时期形成的满文本差异,与汉文本和《满文老档》等太宗朝史料也有对比研究的价值。

满文《清太宗实录》诸本,从体例、版本版式、内容等诸多方面均有差异,反映不同朝对于太宗朝事的不同认知。从各本成书年代考量,成书越早史料价值越高。清入关前,各类文书档案记载多用满文书写,当时所成史籍也多形成满文本,再译成汉文,满文本价值大于汉文本。满文《清太宗实录》顺治本的研究尤其应该引起关注,其成书最早,保存史料丰富,不失为清初官方记载的价值。康熙本经康熙皇

① 《满文老档》有原档及乾隆朝抄档。原档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以《满文原档》为名影印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藏乾隆抄本中的有圈点正本,以《内阁藏本满文老档》为名影印出版。

② 李德启编译:《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本牌》,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5年版。关孝廉翻译汉文译文,刊登于《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辑。

③ 关孝廉翻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逃人档、纸质折件及盛京五部中吏、户、礼、兵四部档案,汉文译文刊登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辑。郭成康、刘景宪翻译,屈六生审校:《盛京刑部原档》,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

帝批阅,矫正了从人地名、语法、内容等诸多问题。乾隆本在康熙本之上适当校订人地名等。诸本均有其不同的史料价值。满文《清太宗实录》诸本为清初太宗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民族、地理、风俗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文献基础。

随着数字技术应用于历史文献之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清实录》一部小红绫本经过整理编目、彩色扫描、图像识别等一系列工作,2019年9月,满文清实录全文检索数据库已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信息化管理平台开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于2020年10月在互联网上开放了《清实录》汉文全文检索数据库。满汉文两个《清实录》全文检索数据库的开放,形成了《清实录》满汉文本对照的海量数据,为满汉文《清实录》研究提供了更广泛的文献基础和更为便捷的途径。

参考文献:

- [1] 陈捷先. 满文清实录研究[M]. 台北:大化书局,1978.
- [2] 谢贵安. 清实录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3] 齐木德道尔吉. 关于康熙本《三朝实录》[J]. 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2).
- [4] 庄吉发. 清太宗汉文实录初纂本与重修本的比较[G]//清史论集(十四).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4:167.
- [5] 胡恒. 《清实录》内阁小红绫本下落考[J]. 文献,2020,(2).
-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顺治朝)[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 [7] 徐中舒. 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G]//明清史料(首本).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刊,1930:10.
- [8] 石文蕴. 清代文书抬头制度探微[J]. 中国档案,2020,(6).
- [9] 天聪九年档[M]. 关嘉禄,佟永功,编译.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The Version and Its Value of Manchu “Records of Emperor Taizong in the Qing Dynasty”

XU Li

(Department of Manchu Language; First Historic Archives of China; Beijing 100034; China)

Abstract: “Records of Emperor Taizong in the Qing Dynasty” has been edited and revised many times, and different editions have been formed. Each edition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nt records are not the same. China’s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contains the Manchu texts compiled by different dynasties of the Qing Dynasty, with different forms and styles. Mastering the compilation of the Manchu text will help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versions of Manchu ancient book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evolution of Manchu language, script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Qing history.

Key words: Records of Qing Dynasty; Huang Taiji; Manchu